

# 致敬！抗战烽火中的英雄儿女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百多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期《两江潮》,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战火中奋力抗争的普通

人的身影。那烽火中高校师生们西迁的艰难跋涉;那背“抗战炭花”的拐耙子哥们在崎岖山路上的血泪行走;那《南京照相馆》里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恐惧与坚守、泪水与期盼、勇敢与坚毅,让历史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历史的丰碑上,既有英雄的名字,也有无数平凡人的印记。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微光汇聚,照亮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漫漫征途。致敬每一位在战火中挺身而出的英雄儿女!

——编者

## 文脉存续:另一种“愈炸愈强”

■郑劲松

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悲壮而温馨的一幕。

1938年11月,一天黄昏,沙坪坝街头突然走来一群“风尘仆仆”的鸡鸭牛羊牲畜大军,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像乞丐似的。

“牛来了,牛来了!我们的牛来了!”有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前身)农学院的学生在激动地呼喊,他们还认得这些一年前曾朝夕相处的伙伴:荷兰牛、英国猪、美国鸡、北京鸭……

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正乘车从沙坪坝进城,与这群牲畜大军不期而遇。

后来,他在题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的回忆文章中动情诉说:“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西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罗家伦先生的比喻很妥帖,赶牛人、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王西亭真像苏武那样不辱使命,千里“放牧”,把这批优良品种一个不少地带到了大后方。“动物西迁”成了抗战时期教育内迁史上的一则佳话。那段烽火岁月,来到重庆的高校大多是西迁,它们一路向西,保存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文脉存续,这是另一种“愈炸愈强”的重庆坚韧精神的历史内核。

与其他内迁高校相比,中央大学动身最早而且一开始就明确地点,避免了“一迁再迁”的折腾与损失。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经感慨:“抗战时期,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央大学接到内迁指令。“一路向西,直达重庆,没有丝毫犹豫。”1937年10月,在罗家伦的支持下,中央大学7个学院15000名学生、1000名教职员工及家属共4000人,携带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共1900个箱子开始西迁。在下关码头,他们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鼎力相助,至11月基本完成迁徙,主校区设在了沙坪坝松林坡。

### 二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当我在南京大学校史资料上看到这两句话时,禁不住眼睛湿润。

面对农学院无法带走的1000多只动物,罗家伦宣布:“学校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均可,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此外,每个品种挑选最好的一对迁走,留做实验之用。”

这项任务落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技术员王西亭肩上。1937年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千钧一发之际,王西亭高价雇四艘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上江面上船。

四艘大木船在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在浦口登陆,一上岸就沿浦镇至合肥的公路驱赶前行。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际,“动物大军”已行至百十里之外。

第二年秋天,“动物大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到宜昌。宜昌交通部门负责人深为感动,同意将轮船底舱改造成家畜临时专用舱并免收运费,输送至重庆。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

那天,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还有附近的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师生、市民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或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

同仇敌愾,患难真情。动物们来了,中央大学却没有适合的农场供其放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伸出援手,借出本校磁器口农场,供放养和实验之用,还提供房屋四间给农场人员寄宿办公;巴县中学租借附近10亩土地,给中央大学开辟为乳牛场,南京运来的名贵乳牛全部得以在此繁殖;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部分

专家还到了荣昌刚创办不久的四川建华农业职业学校(今西南大学荣昌校区)指导“荣昌猪”“内江猪”等地方著名种猪的繁育。

教育内迁,保存中华文脉。可侵略者不会放过一张这样的“宁静书桌”,中央大学在重庆就被炸过三次。

1941年夏天,罗家伦在警报声中怀着悲愤的心情写道:“敌人还是不放我们的……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下,我照常的和同仁们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办公。修好以后,照常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里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上课……”

### 三

敌机轰炸中死伤最惨重的是内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1940年5月27日,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等7名师生在轰炸中遇难。

但轰炸没能炸垮复旦师生的意志。“以嘉陵江畔的琅琅书声作为对轰炸声的最强有力回击。”复旦大学校友蔡可读在《夏坝岁月》中写道:“校园上空时常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但更常听到的是同学们的琅琅读书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做功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学校不通电,就用电石灯、桐油灯、蜡烛挑灯夜战;学生们把掺着虫、皮、稗、石、沙、老鼠屎的粥饭叫‘八宝饭’,戏称碎石沙子助消化;下饭的盐煮胡豆也是粒数有限,大家互相监督不许多吃。”

同样艰难而动人的情景出现在沙坪坝的小龙坎和九龙坡的黄桷坪。1940年秋,上海交大(指上海交大总校,当时该校有北京、唐山、上海等多所分校)在重庆重新建立。校舍暂借沙坪坝小龙坎无线电厂宿舍改建而成。

上海交大校友束耀生在《重庆小龙坎大初见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大部分为沦陷区来的穷学生,依靠贷金读书,生活清苦简朴,连课本也买不起。大多数同学是上课记笔记,课后互相对照着补充,互相切磋,亲密无间……有时互相日夜不断,紧急警报日夜也不解除,以致只能24小时躲在防空洞中……后来我们习惯了,就用听到飞机声才进防空洞的办法来对付。全校师生都同仇敌愾,无所畏惧,有时还上课,以补失去的时间。”

1942年夏天,上海交大迁到九龙坡黄桷坪,校舍由交通部电讯人员训练所改建而成,位于现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初建九龙坡时,房子虽已建好,但电灯未装,晚上自修靠菜油灯。”交大老校友袁森森在《银发忆旧学》中回忆:“每人一盏,油烟很大,我戴着口罩,一会儿鼻子就变黑了。但学生们专心做功课,别的都不顾,也无怨言。”

由于条件过于简陋,宿舍卫生条件很差,“最令人头痛的是讨厌的臭虫。”另一位校友孙良起回忆:“为防臭虫从地面爬上床,我们把四个床脚分别用香烟罐头套上,灌水,在地面和床脚间构成一圈护城河,臭虫就不能入侵了。”

### 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无须更多引用内迁高校师生的回忆文字,足以说明80多年前的大学经历着怎样的烽火岁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这句名言,出自抗战前夕。我以为用来概括抗战内迁高校的境界更为精准。

不管是昆明的西南联大,陕西汉中的西北联大,还是西迁贵州湘潭的浙大,迁到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以及迁到重庆的多所大学,校舍都十分简陋,大多泥墙草屋凑合。

没有大楼,却有大师,更有信仰、有风骨、有气节、有性情、有血性与使命。这,或许正是“愈炸愈强”的基因密码。

这样的密码在哪里呢?重回历史现场,或许可以解密。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松林坡有一处纪念亭,亭里有一块镌刻着“中央大学迁渝铭略”的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几句——

“万里流离,会于蜀山,居陋室,食糗粟,且时有敌机之扰。于是敌愾同仇,夙兴夜寐,益发愤于授业传道……渝校师生,国难漂泊,忠义愤激,救亡雪耻,弦诵不绝……”

从碑文里,我们该读懂什么?(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副馆长)

■唐富斌

拐耙子,渝南山区下力人的工具。拐耙子哥,就得名于那把拐耙子;得名于弯弯山路上那背负着“抗战炭花”拐来拐去跋涉的身影。

重走80多年前的炭花古道,当看到路石上残留的串串拐耙子坑窝,仿佛就迎面遇见了当初的那位拐耙子哥。

血色的抗战岁月,在渝南万盛,除南桐、东林两大国有煤矿外,孝子河流域以东,还分布着星火般的小煤窑和小焦厂。

那时,区域内,仅一条1935年开建、1937年竣工的川湘公路,它如纽带,连接起川黔公路、抗战大后方重庆和烽烟滚滚的前线。水运则是走孝子河航道。偏僻地区的炭花要先送往孝子河上的近10个码头,再船运至长江岸上的炼钢厂、枪炮铸造厂,依靠的正是山谷间麻绳一样的炭花古道,蚂蚁一样的拐耙子哥。

炭花其实不是花,学名称焦炭。一种由煤在隔绝空气条件下,以千度高温烧炼、分解而成的固定碳,光照下,呈冷峻的银灰色或灰黑色,被喻为冶炼、铸造业的心脏。

清咸丰元年(1851年)的文献曾记述:“焦炭窑,万盛场人专业,以油煤煅成碎个,无烟易燃,俗称炭花。”由此,古漆州万盛的煤炭开采和炼焦史,可见一斑。

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时,中国的钢产量还不到日本的1/10。而炼钢、枪炮制造所需的几个煤矿却处于沦陷区。危难之时,偏僻黑山西麓罕有的优质焦煤,便秘密走上了能源工业的前台。

大暑后的一天,在万盛南桐镇麒麟村的艳阳社,我见到了背运“抗战炭花”的最后一位拐耙子哥——95岁高龄的陈再华。

陈老11岁起便每天凌晨4:30出门,跟随100多人的炭花背运队伍,蹒跚

行进在一条串起赶塘、苗子坡、四棱碑、梁山垭、高粱梯、石鱼鳅等20多个小地方,长约16公里的炭花古道上。

提及那段往事,老人口齿不关风的话语,犹如残缺的铭文和简牍。他还找来沾满岁月尘埃的拐耙子、炭花背篋行头,并操弄给我们看。那些崎岖路上的行走,仿佛就在昨天。“抗战我也没缺席”的自豪,充盈了那张堆满沧桑的脸。

炭花古道上的拐耙子哥,多是厚道忠义的下力人。出生于孝子河船运世家的张先生,讲述了另一位拐耙子哥的往事。那人浑名叫谢大脚,一位一次短距离背炭花可达400多斤,力超不少男性的汉子。

某天,一位来自外地的男性拐耙子哥,提出与她一赛高下。拐耙子哥群体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即,看谁背的“抗战炭花”多,到达码头的速度快,输者,一次以其一趟的力钱交付赢者。不料,好胜心切的那位拐耙子哥在途中崴脚致伤输了比赛。谢大脚深感“同是国难受苦人”,不但没有收取赢钱,反而将自己的那趟力钱给了这位家破人亡的他乡逃难人,用于疗伤。

而今,80多年前背“抗战炭花”的拐耙子哥,大都遁入岁月的烟海。为了回顾这段百姓群体以血汗支援抗战的历史,今年刚入夏,我就先后步行体验了3条炭花古道。原先川流不息的古道,绝大多数已被美丽的乡村公路所替代。要走老路,只得去荒草丛中寻觅。

炭窝至杨柳湾约18公里的一条炭花古道中,大梁子山下到大梁子山岚垭路段,坡度多在五六十度。令人摆脑袋的“六十一步”,竟然陡峭达80多度。

那梯步啊,恰似大山这台钢琴的琴键,负荷“抗战炭花”的拐耙子哥,则以沉重的脚步、飞溅的汗珠,在琴键上一次次叩响了国家和劳苦大众命运的

交响曲。我虽轻装而行,但身上毛孔溢出的汗液依旧如雨后山体的汩汩冒泉。攀上大梁子山,披着阵阵松风,回望来时的路,我忍不住即兴吟咏:“拔地三千丈/冲霄一箭遥/拐耙头触径/天上不堪瞧”。

令人欣慰的是,“六十一步”,作为万盛这个国家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转型试验区的一个小地名,前不久已被收录进《万盛地名志》《万盛交通志》。一路上,炭花古道敲击人心的,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拐耙子坑窝。

拐耙子哥为预防路滑,脚上均要穿戴摩擦力大的草鞋或草脚丫,手里习惯性持有一把拐耙子。

所谓拐耙子,其形状若猪八戒的钉耙,由双牛角似的把手与手颈粗的独木棒以卯榫相斗接,触地部位装有一枚铁钉。

作为下力人的好帮手,拐耙子既能当拐杖相助其在风雨中前行,又可在路途劳顿时作“千斤顶”,随时撑起炭花背篋让人站立着休息。而石板路面上那累累的坑窝,正是在拐耙子无数次“叮叮”着响的撞击声中留下的记忆。

其间,我曾拨开一块被枯草和泥巴覆盖,厚度约0.1米、面积约0.3平方米的断石,这里的拐耙子坑窝多达五六十个。更有甚者,有的断石还被拐耙子凿穿。再躬身观察,石板路均被汗水、脚趾磨成了泥窝窝。

寻常人的身躯看似微小。但是,当他们的心跳、目光一旦与家国的命运同频共振,那渺小的能量就会呈几何级数聚合。

拐耙子哥们所奉献的,是一条顽强勒住恶魔日寇颈脖的钢绳,更是一座用血汗反复浸润、令人肃穆的丰碑。拐耙子哥的称号,可谓一撇一捺,全是硬骨;滴滴汗汗,皆是家。我想历史不会因为他们的无名而忘记他们。

## 历史的沉重与人性的微光

——电影《南京照相馆》观后

观潮



■苏其善

电影《南京照相馆》以强烈震撼的画面和以小见大的视角,让我仿佛被时光的洪流卷入了1937年那座陷入至暗时刻的南京城。

看完这部电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影片中的一幕幕故事如同潮水般在脑海不停翻涌。

《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视角——南京沦陷时期的一间小小照相馆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关于正义、勇气与人性的故事。它没有刻意去渲染战争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选择用一种相对克制的方式,透过“照片”这一媒介,将那

段惨痛的历史缓缓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鲜活而生动,他们原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邮差阿昌为了生计奔波,只想保命,却在目睹日军的暴行后,内心的良知逐渐觉醒,最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守护能证明日军罪行的底片。

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沉稳坚毅,为了守护真相,出谋划策,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退缩。

戏伶毓秀,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经历了日军的残暴后,凭借着骨子里的坚韧与傲骨,与众人一起在日军眼皮底下勇敢地周旋。从一个被蹂躏的女演员,成长为坚韧的真相传递者,她的转变体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坚强与不屈。

翻译官王广海,他在利益与良知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在觉醒中选择了反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平凡的人,在战争的漩涡中,被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影片中的许多场景让我印象深刻。阿昌在冲洗照片时,一张张同胞被屠杀的画面映入眼帘,他那惊恐又愤怒的眼神,让银幕前的观众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

当老金拉动照相背景布,北京故宫、天津劝业场、上海城隍庙、杭州柳浪闻莺、武汉黄鹤楼等一幅幅画面依次出现,大家一起念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时,我的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在照相馆里,老金用一幅幅手绘的大好河山“洋片”作背景,为大家拍下最后一组全家福,随后走向生离死别。那一刻,中国人的坚韧不屈、文化根脉的绵延不绝,极为具象化地呈现出来。

影片展现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即使身处绝境,即使山河破碎,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和捍卫主权的决心也从未消失。

暗房里,随着照片的逐渐显影,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家熟悉的街坊邻居。

普通百姓在绝境中展现出来的勇敢与担当,令人动容。他们本是为了求生而聚集在照相馆,可当看到同胞遭受苦难、国家面临危难时,毅然决然选择挺身而出,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守护住真相,守护住民族的尊严。

电影中,日军一边在南京城屠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边妄图通过拍摄“亲善照”来掩盖罪行。

摄影师伊藤表面上温文尔雅,实则内心凶残无比,他用相机记录下血腥屠杀,还要企图用“仁义礼智信”来美化侵略,这种道貌岸然的行径令人发指。无数无辜老百姓鲜活地生命,在日军的铁蹄下,如蝼蚁般脆弱,任人践踏,曾经鲜活的生命成为了日军炫耀战功的冰冷影像。

这部电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我们重温那段惨痛的历史,更在于它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南京大屠杀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消逝的生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我们如今的和平与幸福,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南京照相馆》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历史课。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吾辈当自强。我们应当从电影中汲取力量,传承先辈们不屈的精神,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未来。